

论民国时期四川农业的变迁

陈 国 生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在动荡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四川农业生产曾一度迅速而畸型地向前发展,土地开发和粮食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地域特色。究其原因,在于因地制宜发挥地区条件优势、市场需求量增大、国民政府的大力提倡等等。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四川农业经济 耕地 人口 农业地域特色

民国时期是四川^[1]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不稳定的经济条件,不仅制约了这一时期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也规定着农业生产的地域布局。特别是8年抗战时期由于四川国防的重要性,四川农业生产还一度迅速而畸型地向前发展。这一时期土地开发在过去的基础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全省普遍地扩大了耕地面积,改善了耕作条件,增加了复种指数和产量,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特别是成都平原已被开拓为全国性的基本农业经济区,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而农业中的粮食生产的发展更为突出,其赋粮额竟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2]。尽管如此,由于外患内战频繁,经济利益屈从于国防和政权利益,加上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而战争又造成环境恶化,天灾人祸不断,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干扰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农业经济大发展和农业环境大动荡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时四川农业的基本特征。

一 民国时期四川农业生产的环境和基础

民国时期四川省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可以分为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辛亥革命后1912年“四川省军政府”建立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为止;后期从1937年末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人口和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先看四川的人口条件。据《修正民国元年内务部汇选宣统年间四川人口统计表》记载,1912年,四川全省人口为43442815人^[3],占全国总人口的10.77%,自此以后四川一直保持约占全国人口1/10的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但是这并非四川的实际人口,因为按统计资料计算,当时男女之比高达1.31,说明统计时至少漏记了不少女性。当然相对于前期其它人口数据,这一数字还是清末民初最全面的户口统计资料,因为这一人口数系四川总督根据清廷民政部1908年颁布的统一章程亲自督办的全省性户口登记,以县屯为基本统计单位进行,其人口登记范围包括全省146县3屯(含少数民族),并列出国会成都的人口、军队、驻防人口

和船户人口,比较接近实际。经过25年的发展,到1937年,四川人口已达到50468211人^[4]。可见前期四川人口净增率为16.17%,年均增长率为5.8%,相应的全省人口密度由76.46人/km²上升到88.3人/km²。但是民国后期人口数量起伏较大,从1937年到1941年由5047万降至4900万左右,1944年又回升为5000万,1947年再度降为4976万,1948年仍增至5012万^[5]。从1937年到1948年四川人口总数大约减少了34.9万,即人口下降了0.7%。8年抗战和3年内战时期,四川省虽然不是主要战场,没有因战乱损失大量人口,但是四川每年数以10万计的男性青壮年人口被征入伍,开赴前线,又有大量农村青年为了“躲壮丁”而逃匿,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四川人口的大量减少。同时由于正面战场节节失败,国民政府又西迁重庆。这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各部委以及大批沦陷区难民、学生也先后乘船入川,这些入川者中非农业生产人口占有很大比重。据民生公司所办《新世界》(半月刊)记载,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7月该公司承载抵渝人员12万多人,其中公务人员占50%,即6万余人;难民难童约占45%,即5.4万人;学生占5%,约6000余人^[6]。此外,由于战事频繁,四川农户承担大量夫役兵差。省内各行政督察区均设有战时运输处,负责配合军队的调动,以便及时征集民夫、征购粮食和运送食盐等物资。据统计,到1942年止,四川农户在征调兵役后,完全没有壮丁的占16.2%,因征调工役而完全失去壮丁的家庭占14.9%^[7]。这样看来,后期四川人口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从事军事活动人口比重较大,一是消费人口比重较大。

再看四川的耕地条件。耕地是农业之母,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高低除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外,亦与耕地面积大小和垦殖指数相联系。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耕地一直没有进行清丈,仅30年代初在部分县份实行过“土地陈报”,因而各种数据之间轩轻悬殊。1922年,农商部刊行《农商统计表》称1914年四川耕地约124.8849万顷,而1939年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省概况》又称1937年全省(包括雅、宁两属)耕地约108万顷(尚缺数县),西康省政府编印《西康概况》时估计西康耕地0.4万多顷。由于1937年的统计数字是在南京政府控制了四川政局之后,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军事管制委员会行营”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条例”时进行的土地详查,当然更符合实际。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民间隐田(其中亦有“步弓法”土地测量失实的成分),如1985年四川按标准亩概查全川耕地132万顷,但国家区划局利用卫星摄影,采用“成图法”进行耕地计算,得出全省实际耕地约171万顷^[8],为上报耕地的1.3倍。以此校正1937年四川地区实际耕地应为141万顷(108.4×1.3),考虑到1937年的耕地数尚缺仁寿、屏山、古蔺、巫山、靖化、盐源、宁南、灌县和三峡实验区(在今重庆北)的统计数据,今按人均2.2亩估算,应补耕地4.3万顷,因此1937年四川地区实有耕地145.3万顷。至于民国后期的土地数字,可以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土地普查资料倒推而得,当时四川耕地有116万顷^[9],再结合1937年统计的108.4万顷,使用“内插法”,得出1948年耕地为113.6万顷;同样以实际耕地为上报耕地的1.3倍校正,可知1948年耕地实有147.7万顷。四川耕地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95万顷到1937年的145.3万顷,再到1948年的147.7万顷,反映了四川耕地垦殖仍以年均3.64%或1.5%的速度增长着。民国后期,虽人口下降了0.7%,但耕地面积却增加了1.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为增产粮棉和安置难民而大力提倡开荒垦殖、扩大耕种面积。1938年2月,四川省政府通过了《公共坟地地面种植杂粮规则》,规定在文至第二个月内,各县市即将境内公共坟地悉数招佃垦种作物。同月又制定颁布了《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划通、南、巴、城口、万源;北川、平武;松、理、茂、汶;天、芦、宝;西、秀、彭水、黔江;东西山;南川金佛山;雷、马、屏、峨;昭觉、宁南、盐源、盐边;华蓥山和

昭、广、剑阁等 11 个区域内之官荒为垦殖范围。1939 年 12 月又制定了《四川省垦务委员会难民移垦实施方案》指导难民开垦^[10]。自此四川开荒运动如火如荼,到 1944 年,在全国 153 个公私垦殖单位中,四川占 53 个,居第一位;垦民 24834 个,次于陕西,居全国第二位;是年全川垦殖面积达 29 万亩^[11]。正是耕地面积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四川农业经济缓慢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 农业生产的地域特色

(一) 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

四川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质土质宜于作物生长,谷地夏季多水稻,冬季多小麦;岗地则产甜薯、玉蜀黍、高粱、黄豆之属,均以粮食作物为主。据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统计,1939 年至 1944 年,六年平均夏季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72.2%,冬季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46.1%^[12]。作为四川农业精华的水稻更出尽风头,民国时水稻布局在盆周地区迅速扩大,并随着梯田化的浪潮涌向丘陵山地高处,遍布全省每一个县份。如川北丘陵区在民初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拓垦成为农业之急务,“有暇就谋农场之扩张,于是山隈土角,锄痕殆遍”,到处“有长不及丈,宽仅盈尺的稻田”^[13]。特别是盆地内部稻海麦浪,纷纷呈祥。1931 年,董时进考察四川“由渝至蓉所经山坡,远望一似荒岭,及接近,始知其由脚至顶,无一非耕地。龙泉驿山坡可谓高而急,然半山之上,犹不乏水田,山顶之上,不乏旱田”^[14],成为四川稻谷的集中产区。即使是西康地区到民国后期水稻种植亦有很大发展,宁属(即今凉山、攀枝花两州市)的安宁河谷地已成为西南屈指可数的谷仓,年产大米 200 余万石^[15]。然而,由于四川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军阀的掠夺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之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大大落后于我国沿海地区;而且缺乏高产品种,双季稻推广面积有限,全年平均亩产不过三四百斤(如表 1)。

表 1. 民国时期四川水稻生产的官方统计表

年代	播种面积	总产量	平均亩产	资料出处
1914—1918	48.84 万顷	14946.7 万担	306	农商部 1922 年《农商统计表》
1931—1938	35.73 万顷	12484.2 万担	348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
1939—1944	31.54 万顷	12486.9 万担	396	1946 年《四川经济季刊》第 3 卷
1949	51.54 万顷	18560.0 万担	360	1984 年《四川省情》

四川产稻闻名全国,历年外销他省,但是 30 年代以来却每年进口湘米^[16]。1932 年,四川总产量为 15207 万担,1933 年则为 12405 万担,“大部分中下层人民全年多食杂粮,少食稻米,除高粱多用于制酒外,玉米、甘薯等杂粮悉为民间主要食品”^[17]。到 1939—1944 年,红薯、大小麦、玉米、豆类、马铃薯等杂粮种植面积较之稻谷年均种植的 2907.4 万亩大得多,如玉米年均种植 1327 万亩,红薯亦达 998.7 万亩,小麦 1731 万亩,豌豆 967 万亩,蚕豆 926 万亩。尽管杂粮因粗放经营,亩产低,但总产量亦达 1.1 亿担(红薯、洋芋以 2 公斤折合 1 市斤计),与稻谷年产 1.13 亿担持平^[18]。

小麦在四川是最重要的杂粮作物,在低谷平地常与稻谷复种,丘陵山区则成为主要的食物,一直是四川播种面积最大的冬季作物,平均亩产 200 斤上下,播种面积 18 万顷左右,总产量约 3600 万担,具体情况列如表 2^[19]。

表2. 民国时期四川小麦生产的官方统计

年代	1931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9
播种面积 (万顷)	18.44		16.22	17.82	19.50	17.92	17.61	18.98	22.57	15.10
总产量 (万担)	2646.3	3115.3	3839.5	2860.2	4943.8	4187.4	3566.8	3687.2	5572.0	2000.0
亩产 (斤)	144		237	161	254	234	203	194	247	131

同时由于人口增加,灾害战争频仍,时有饥谨发生,大麦作为备荒杂粮,在丘陵、山区的种植又有发展,全省总产量常居全国第二位,30年代年均播种面积为15.9万顷,产量约1586万担。特别在抗战时期更是大力发展,1942年产量即达到2922.3万担,居全国首位^[20]。不过,大麦的分布常在小麦的种植圈之外,因此其分布主要集中在川北地区。玉米的总产量在杂粮中仅次于红薯和大小麦而居第三位,1931、1936、1941、1949年播种面积分别为12.75、9.96、11.42、20.41万顷;产量依次为2219、2022、2574、2560万担,其中盆周山区的玉米播种面积占当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两成以上,仅次于水稻,是四川玉米的集中产区,此外盆东平行岭谷区也是四川玉米主要生产区^[21]。红薯布局刚好相反,在盆周山区种植较少,而在盆地中部低山丘陵地区种植普遍,占红薯总面积的80%左右,一直栽培2万顷以上。由于红薯是亚热带作物,宜于温暖潮湿地区生长,而盆周区气候偏冷,致使红薯很难收藏过冬。由于红薯这一致命弱点,以致它极少传入川西。抗战中为备战备荒,红薯成为垦荒的先锋作物,在川西南等中山区得到推广,使得全省红薯的总面积由1936年的6.56万顷,增加到1941年的9.31万顷,1949年的13.20万顷;总产量亦由1936年的4604万担(居全国第二位),增加到1941年的7401万担,1949年的12433万担^[22],成为我国红薯生产的第一大省。

为了进一步说明四川前期与后期粮食作物产量的详细变动情况,下面列如表3。

表3. 民国前后期四川粮食作物年均产量变动表 (单位:万担)

年代	产量														合计
	品种	水稻	糯稻	小麦	大麦	玉米	甘薯	高粱	小米	燕麦	荞麦	豌豆	蚕豆		
1931-1937		143675	11089	36335	27480	27383	53587	11971	1523	1442	9898	14096	14601	341240	
1938-1944		107894	9189	39561	24517	29462	61507	12294	1161	1416	7314	16076	13986	324375	

(资料来源:《战时四川粮食生产》,《四川经济季刊》1946年第3卷)

从表中可以看出,甘薯、小麦、豌豆、高粱、玉米等五种作物后期产量高于前期,其中以甘薯增长幅度最大,而水稻、大麦、糯稻、蚕豆、小米、燕麦则全部减产。若以稻谷、杂粮而论,则稻谷后期较之前期减少37681万担,杂粮反而增加20716万担。造成主杂粮这种反常比例的出现,固然与四川的租佃习惯相关,地主皆稻谷租,杂粮则归佃农,因此佃农多不愿意增加稻谷而致力于杂粮种植^[23]。但是,当时四川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靠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复种指数来实现的,作为“一身系天下(粮食)之安危”的水稻,单位产量反而下降,如1942年和1943年水稻平均亩产为303斤和281斤,糯稻平均亩产为278斤和287年,均低于1936年的332斤和316斤^[24]。这说明本省粗放的耕作并未改观,反而加剧,最终导致了水稻总产量的下降。

(二)经济作物的地域分布

民国四川农业中经济作物较为发达,其中木棉、蚕桑、茶叶、烟草等种植业都已在局部地区形成专门化商品生产区,这在四川农业发展史上还是十分重大的事情。

民国四川油菜籽产量常居全国之首,菜油输出量为各省之最。现将民国四川油菜籽生产情况列表如下^[25]。

表4. 民国时期四川油菜生产的官方统计

年份	1931	1932	1936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面积(千亩)	4600	14430	12545	7477	8366	12558	8909	6758	6795
产量(千担)	4570		14877	8791	7883	10928	6556	5697	5764

抗战以来由于植物油需求量增加,油菜籽的价格首先上涨,故1939年和1940年种植面积大为增加。但是自1940年起,粮价上涨速度快于菜籽,故1941年油菜种植面积较1940年减少360万亩,产量亦减少90万担。1943年虽略有增加,但仍不明显。到1949年,油菜生产跌到低谷,播种面积仅3.44万顷,产量仅309.9万担。这反映出油菜生产的兴衰与市场供求相始终,其生产布局围绕着市场供求关系而盈缩。

四川糖料作物只有甘蔗。民国时甘蔗种植区已遍及各大河谷地带,尤其是沱江流域的内江、简阳、资中、资阳、威远一带已发展成为四川的重要甘蔗生产基地,如内江全县耕地面积共527307亩,其中水田209912亩,旱地317395亩,旱地除一部分种杂粮外,其余俱种甘蔗,平均每户作物面积约43.3亩,而种蔗面积则达24.9亩,计种蔗面积约占作物面积的57.5%^[26]。在1930年,仅资中、内江、简阳3县种植面积就占0.53万顷,相当于全川的一半^[27],故农户多以植蔗为生。民国时代四川种蔗业极盛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市场交易活跃,蔗价提高,刺激了蔗农积极性。以后由于军阀混战,糖房地主剥削,国民政府苛捐杂税及外糖输入等社会原因又严重地抑制了甘蔗生产的扩大。抗战以后沿海各省的蔗糖区域相继沦陷,四川便成为战时蔗糖的唯一产区,1938、1939、1940、1941、1942年四川甘蔗种植面积分别为135、122、143、96、72万亩,产量相应为4126、1711、2343、1412、929万担^[28]。1939年,不仅种植面积比1938年减少10万亩,而且因遭受特大虫害,产量锐减,仅1711万担。同时因战区扩大,食糖进口困难,而省内食糖消费增加,价格上涨,1940年,面积产量均显著增加。自此之后,亦与其它特产同受粮价上涨的影响,加之食糖专卖,以至1941、1942年面积和产量又形减少。自此川蔗生产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到1949年,全省甘蔗栽培面积竟只有30.6万亩。

四川茶业,自古已盛。《茶经》载:“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可见李唐时期四川产茶已名闻宇内。宋元以降,实行榷茶制度,四川尤为专卖实施重点地区,川茶业更茁壮成长。洎乎辛亥鼎革,川境因军阀盘踞,连年构兵,川茶在旧引茶制束缚下难敌国际市场上日本、印度、锡兰茶的打击而一蹶不振,产量由30余万担骤减为10余万担。1938年,贸易委员会负责管理茶叶产销后,曾竭力提高茶质,改善茶商组织,使战时川茶稍有恢复。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划出西康省后,四川茶法因地而异,朝令夕改;官僚政府亦奋力渔夺;再加上1942年太平洋战争使香港、仰光相继沦陷,外销中断,茶业再度陷于衰落之中。尽管如此,但川茶毕竟甲于西南各省,外销虽已不占重要地位,但边茶销售事业却长盛难衰,所以四川茶业除湘浙两省外绝无其匹,即皖赣两省,以产地分布而论,亦无出其右。当时全省产茶县多达90个,占总县数的75%。其中30余县还分布有专业茶园,以灌县为中心的西路茶区,以名山、邛崃、西康为中

心的南路茶区,以屏山、峨眉、夹江为中心的下河茶区,以万县、达县、忠县为中心的东路茶区,其茶业经营都已走上专门化道路,这在当时茶叶价格普遍低落,且又饱受政府和茶商压级压价百般勒索的情况下能发展到这一步,的确是极不容易的。

四川种烟以红花烟草为主,抗战前川烟年均播种面积约2.5万顷,产量300余万担,均居全国之首。集中产区在成都平原,什邡一县即年产烟30万担左右,常居全省总额的一成以上,其次是郫县、绵竹、新都、温江,这五县年产烟多达70万担,占全川总额的23.3%。抗战开始后,政府提倡粮食种植,烟草生产规模得以控制,这一状况在表5中足以反映出来。

表5. 战时四川烟草生产官方统计

年份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面积(千市亩)	47	927	1002	904	777	1035
产量(千市担)	49	1425	1306	953	884	

(资料来源:《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期)

1938年,全省种烟仅4.7万亩,产量不过4900担。其后因战区扩大,后方烟草销量增加,烟价上涨,植烟面积随之扩大,1940年,全省烟田达90万亩,产量增至140万担。1941年,烟草面积继续增加,但产量因收成欠佳而回减,1942年以后,因受粮价上涨影响更加快了衰减步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四川农业地理变化中鸦片已成为当地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在1906—1908年,四川年产鸦片分别为51134、57463、44519担,一直稳居全国榜首^[29],按每亩产鸦片50两计算,估计四川每年约有100万亩鸦片烟田。民国初年四川政府表面上严厉禁止罂粟的种植,但川西南、川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军阀地主和土匪烟贩的鼓动之下鸦片生产阔步发展,所以到了20年代,即使在盆地内部亦无一县不种鸦片,每年鸦片产量在40万担以上,鸦片田约8万顷,大大超过烟草种植规模。烟草、罂粟的泛滥不仅严重地危害了四川人民的身心健康,同时也给四川农业带来了不良后果,致使广大良田沃野被挤占,粮食减产,地力下降,就连过去产量较高的玉米,这时不仅种植面积缩减,而且亩产也不过二三百斤,从而大大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对本省社会经济结构的畸型变化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厉行禁止,当然对于西部山区仍力有未逮,特别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代购烟种”,号召大种鸦片,使得川西地区鸦片生产一枝独秀,更加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

川省气候多湿,产棉区域较小。抗战以后,随着产棉区域减少,而棉花需求量日殷,价格逐渐高涨。1940年初,每市担棉花价格不到200元,年底便达1000元,上涨4倍。到1942年3月更涨至1500元,棉花价格持续上扬,棉花成为囤积居奇最理想的商品之一。为此棉花成为抗战期间重点发展的农作物,其历年生产概况见表6。

项 目 \ 年 度	1931—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产量	691	763	1280	1129	952	956	1244	1123	1452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及周开庆《四川经济志》)

虽然当时川省棉产极不稳定,但各年均较战前七年间的平均年产有所增加,多数年份增产的幅度还比较大。主要产区集中于涪江、沱江、岷江、嘉陵江及巴水河川地区的87县,其中遂宁、射洪、仁寿、三台四县最为集中,为川省棉花生产基地,棉田面积常占全省的50%。其次为盐亭、南部、简

阳、仪陇四县,形成了以嘉陵、涪、沱、岷四江为重心的棉花分布格局^[30]。其原因不外乎,一是棉花生产受市场价格制约,具有商品性,因此大规模种植必然要临近水路交通线;二是这些地区多属丘陵山区,地势崎岖,灌溉困难,不适宜于稻谷的大规模生产;加上民国前期四川的军阀割据和经济封锁,而后期则对外交通常常受阻,这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有利于四川植棉业的发展。即便如此,由于川棉多属土种或退化美棉,纤维粗短,适合手纺而不宜机纺,加之四川气候阴雨连绵,而优良棉种的推广面积仍很有限,因此川棉仍不能满足本省的需求。1932—1934年,四川进口货物价值中,棉纺占65.8%,匹头占8.8%^[31],即是明证。

四川是中国重要的蚕丝产地之一。1880年,生丝产量已达6000担,占全国的第五位^[32]。桑树成为四川分布甚广的经济作物,性喜温暖,在四川盆地内部大部分地区均适宜于种植,其品种有鲁桑、湖桑、嘉定桑三种。自1891年英商太古洋行从重庆、万县水路输出川丝568担后,外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四川蚕丝原料的活动,蚕丝在川省各种外贸品中居于首位。在外贸需求急剧增长的刺激下,四川农村掀起了一股“蚕桑热潮”,各地大力推广养蚕新法,引进良种桑树,开辟新的桑园,改进家蚕品种,四川农村植桑养蚕走出副业性生产的狭隘范围,出现了大面积的纯桑园,使得植桑养蚕朝着专业化生产方向发展。在1918年,日本技师明弘经实地调查,认为“四川生茧产量已达64万担,仅次于浙江、广东而居全国第三位”^[33]。1925年,川茧总产量达70万担(折丝4.5万担),创历史最高纪录。1930年,生丝总产量仍达4至5万市担,输出2.3万市担,达历史上最高水平。在产区分布上以川北最集中,桑树常与其他作物大块间作,多数平坦的冲积台地广植桑株,纵横排列,行绪井然,水田埂上亦栽植成行,其他地区也零星分布,其产量几占全省的1/3。盆东次之,年产茧约6万担(合丝1000担)以上者有三台、南充、阆中、乐山、合川、万县、巴县、长寿、涪陵等县,其中以三台产丝量最丰,而以乐山茧质量最优。再次是川西南地区,以嘉定为中心,邻近十数县皆为蚕丝生产区域,其中以井研、仁寿、青神、眉山、夹江、峨眉、洪雅、丹棱、犍为等县尤饶,鼎盛之秋,年产丝5000担以上,与川北、川东蚕桑区成三足鼎立之势,以蚕丝之品质而论,尤冠于全省,缘气候温暖,土质膏腴,为川北、川东所不能及。然而自30年代中期即遇世界经济危机,丝价惨跌,川丝生产日趋衰落。1936年,全省年产丝仅8000市担,出口数额不过4000余担^[34],尚不及30年代的18%。全川丝厂亏损3000余万元,倒闭停业者比比皆是。蚕茧上市,无人问津^[35]。蚕农乃将大块桑园改植其他作物,仅剩路旁、田边与住宅附近隙地之少许桑株,栽培方式多听其自然施,肥管理很少注意^[36]。据估计当时四川60%的桑树遭砍伐,90%的丝业劳动者失业^[37]。抗战后江浙主要丝产区沦陷,鉴于蚕丝为重要的传统创汇作物,国民政府致力于重振四川蚕丝事业。由于四川土蚕种系农民历代相传而未经科学方法选择,品质已濒临退化,为此四川丝业公司就江浙原种培育品种,每年春秋各一次。因蚕体强,收效较有把握,而且颗粒大,茧层厚,丝质条纹一致,可以织高级生丝,深受蚕农喜爱^[38]。1938—1945年,四川推广改良蚕种及丝产概况表明改良蚕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1938年,改良蚕种180778张,此后三年逐步增长,1939—1941年,分别改良蚕种608352张、696106张、700582张,1942—1945年,仍具有一定规模,4年共改良蚕种1909002张。抗战8年,四川改良蚕产量达32848吨,改良丝产量为43755关担(1关担=119市斤)^[39]。尽管如此,四川蚕丝仍未恢复到20年代水平,到1949年,四川桑树仅存2000万株。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四川稻谷产量虽略有下降,但是杂粮和经济作物产量却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不仅保障本省战时人口的衣食之需,并为支援抗战作出了较大贡献。那种认为民国时期四川农业生产“急剧衰退”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民国时期四川杂粮地位

的巩固,经济作物生产的复兴,一些作物地域专门化的生产,其原因在于: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地区条件优势。如川西南各县位居川滇边境,交通不便,民风闭塞,生活艰苦,但是该区气候温和,颇适宜于栽桑养蚕,民国时这里破除陈法、改良蚕种,很快形成为包括筠连、高县、珙县、庆符、长宁、宜宾、兴文各县的蚕丝生产中心,最盛时年产茧约40万公斤^[40]。其次,由于市场需求量增减,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不一,带来作物结构的新变化。从四川省农民所得物价指数看,1937年到1940年,油料作物上涨了5.8倍,工艺作物上涨了7.6倍^[41]。经济作物价格的增涨促使农民扩大种植面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整个耕地面积中的比率因而有所提高,从1938年到1940年,四川油菜种植面积由10.5%上升到15%。黄豆绿豆种植面积由5.1%上升到7.7%,花生种植面积由0.4%上升到1.9%,芝麻种植面积由0.1%上升为1.2%,棉花种植面积由1.9%上升到4.7%^[42]。再次国民政府的大力提倡,这也是民国四川农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1938年四川经济部农本局扶助成立了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从经济上扶持各县兴办水利工程,自1938年到1944年,全省工程贷款累计达3.75亿元^[43],先后完成大型灌溉工程15处,灌田30万亩;堵水坝227座,灌田9.6万亩;凿塘2826口,灌田12.6万亩^[44]。这些农田水利建设都有益于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

注释

[1]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行政区划多次变动。1913年将大渡河以西、金沙江以东地区划为“川边特别区”。1939年又将今甘孜、阿坝、凉山、雅安诸地区划为“西康省”,同时改重庆为直辖市,与四川省平级。为了不使政区变动影响这一时期四川农业发展与分布的系统考察,本文所涉及的四川农业地理范围以清末的省界为准(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的行政区划)。

[2]《国民党政府田赋征实初探》,《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

[3]施居父《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版。

[4]据《四川省民国二十六年年度保甲户查四川各县户口数目统计表》,载《四川经济参考资料》(1939年),尚缺昭觉、盐边二县户口数。

[5]据《四川统计年鉴》(1946年)第1册;《西康省民政统计》(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户口局《全国户口统计总表》(1947年)及《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

[6]《抗战以来本公司的货运与客运》,载《新世界》1938年13卷2、3、4期。

[7]《各省农村劳力征调概况》,农林部农产促委会1943年12月版,第30—37页。

[8]刘宇等《论四川农村非耕地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刊《四川省国土经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

[9]《四川统计年鉴》(1990年)。

[10][11]《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版,下册第43—86页及《新华日报》1944年5月15日。

[12][18][30]《四川粮食及棉花增产问题》,《四川经济季刊》1946年第3卷。

[13]黄主一《川北农民现状之一般》,《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16号。

[14]《考察四川农业及乡村经济情形报告》,《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15][27]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2页、95页。

[16]《四川农村社会的苛捐杂税》,《四川经济季刊》1935年第3卷。

[17]《四川经济考察团报告——农林》,重庆独立出版社,第5页。

[19][44]据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及1984年的《四川省情》有关记载综合。

[21]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第56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46页。

- [22]《四川经济季刊》1945年第2卷第3期。
- [23][24]《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54、55页。
- [25]吕平登《中国农村经济》第22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50页;《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卷第3期。
- [26]《内江蔗糖业概述》,《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4期。
- [28]《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
- [29]《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 [31]四川省政府《四川概况·经济概况》第79页,1939年版。
- [32]《四川蚕业改进史》,第346页。
- [33]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第363—364页。
- [34]《四川蚕丝业》,《新华日报》1942年11月3日。
- [35]1939年四川省政府《四川概况》第三编,第13—14页。
- [36][38]《四川农业推广问题》,《四川经济季刊》1945年第3期。
- [37]《农桑自古甲天府》,《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
- [39]转引自侯德础《试论抗战时期四川农业的艰难发展》,《四川师大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6期。
- [40]《下川南蚕丝业概况》,《四川经济季刊》1945年第4卷第2期。
- [41]《三十二年之四川农业》,《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
- [42]《四川农村建设现状与推进计划》,《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3卷第1期。
- [43]《第三回国民政府年鉴》下册。

(上接第109页)

注释

- [1][3][6][9][12]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1页、第23页、第176页、第183页、第23页。
- [2][4][13]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第5页、第37页。
- [5]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7]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 [8][15]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第154页。
- [10]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 [11]钱玉趾《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见《三星堆文化》第17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 [14][27]崔荣昌《四川方言研究述评》,《中国语文》1994年第6期。
- [16]参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 [17]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 [18]《华阳国志·蜀志》。
- [19]《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
- [20][22]《资治通鉴》卷八二、卷二六六。
- [21]《蜀鉴》卷四引李膺《益州记》。
- [23]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1期。
- [2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 [25]刘君惠等《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1页。
- [26]张籍《永嘉行》。